

前 言

李卓穎

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

近年來，得力於筆記、書信、《宋史全文》等文獻的整理與出版，以及多種年譜、詩文集的彙編與校注，宋代研究領域在先進的持續耕耘與新秀的不斷投入之下，頗見郁郁乎文哉的榮景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和歷史研究所自 2012 年開始合作，召開多次研討會及工作坊，攜手投身於此一國際學術領域。2018 年在國立清華大學的支持下以「喧嘩的伏流：從異質性重看宋代士人文化」組成宋代研究團隊，五位成員除了深化各自的研究之外，更尋求共同關切的議題。經過密切討論，決定以「宋代文獻新視野：研究課題及方法的反省與前瞻」為題於 2019 年舉辦研討會，邀請國內外學者一同回顧宋代研究，並從考察文獻的角度探討未來可運用的研究方法和繼續深入的課題。該研討會三天的議程，每日均有百餘人參與，討論熱烈，往往欲罷不能。多位發表人依著會中的回饋意見修改論文之後投稿本刊。通過審查的文章數量豐富，因而分作兩期刊出。本次先行出版的是較屬歷史研究的論文，較屬文學研究的論著則將在近期內刊出。

本專號有三篇與「移動」相關的文章。伊沛霞教授的論文從文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人對遷徙和移民的看法。相較於既有的研究多半從社會、政治、經濟的角度探討遷徙與移民的成因、過程與影響，伊教授的研究展示了別開生面的取徑，並指出宋代各種類型的文獻資料，以其側重有別，因此可用來對應的研究課題也不盡相同。伊教授的這篇文章尚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要點。首先，是衡量了仕宦經驗之有無如何影響了宋人對遷徙的態度。其次，是強調應重視宋人相關論點所屬的論述脈絡。伊教授舉了一個明顯的例子：即使是為移民家族和其遭遇撰寫大量文字的朱熹，也沒有將離鄉行動和安置移民轉化為道德或政治思想的課題，而是以歷史的、務實的方式看待相關問題。第三，是以中國歷史中的其他時代為參照，藉以映襯出宋代的特殊性。比方說，相對於明代士人常以組織私人慈善機構因應大量難民，宋代士人傾

向於認為安置大量難民是政府的責任，因此以提出政策建議為其主要的應對之道。

吳雅婷教授的研究藉由討論旅行須知、日用類書、旅行備急醫方等三種型態的文獻，分析了宋人為踏上旅程所準備的知識。從這些知識涵蓋的範圍和細節，可以看出在面對旅行中的不確定性時，宋人固然不免有擔憂但也不是全無憑仗的。儘管因資料殘缺而無法完整地將知識流傳過程的所有環節串聯起來，但吳教授仍以綿密的考察工夫，從蛛絲馬跡中觀察到與旅行相關的知識，有在口傳和書寫傳統間來回流動的軌跡。又由於編纂者有意提高知識的實用性，甚至更好地迎合市場的需求，便有朝著簡易而包羅面廣的方向擇取與編訂的傾向。然而，儘管吳教授強調知識的流動性，但她也以備急醫方的分類結構和論列形式為例，指出既有的知識框架仍是編纂者遵循的基本章法。這是對未來研究者的極敏銳的提示：因流動而尚有相當變異性的知識，究竟透過何種程序而固著下來？看似逸離日常軌道的旅行，是否因掌握了知識而成為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？

張聰教授的論文在兩層意義上與「移動」相關。其一，是張教授分析的「淮陰婦女」故事的核心之一在於這位婦女的丈夫死於行旅之中。無論其原因是病死或是遭謀害，行旅都是故事得以展開的關鍵。一如吳雅婷教授的文章所指出的，在許多人因為各種理由而在路上移動著的宋代，行旅當然不是一個全然不可規劃的隨意行動。然而，「淮陰婦女」的故事卻也呈現了行旅是個可能誘發或者促成人倫關係破綻的情況。其二，是張教授細緻地論述了「淮陰婦女」故事如何在不同的時代、作者、流傳型態（口傳與書寫）、文類（包括詩、傳記、筆記、戲劇、地方志等）之間移動而產生了多樣的版本，著重探討了不同作者採用的文類，並強調文類的規範既限制了也凸顯了各版本所能容納的觀點。張教授更進一步闡釋了各作者如何裁量故事的內容與重心，以及如何援用「義」、「節」、「烈」的觀念界定「淮陰婦女」，從而透顯出他們對女性道德的態度。

何復平教授的研究聚焦於南宋晚期羅大經的《鶴林玉露》。與宋代其他時期相較，南宋晚期的文獻相對稀少，因此不容易掌握其情況，也因此何教授這篇深度解讀《鶴林玉露》的論文非常值得重視。根據何教授的分析，儘管筆記體的開放性使該書容納多樣主題，但羅大經並非隨意蒐羅見聞，而是有品評人與事的史家意向，也有通貫且複雜的明確看法。何教授從幾個側面說明：羅大經界定南宋晚期為政治上衰敗但思想上復興的時代；羅大經又將政治的衰敗與典範性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德行對照起來，呈現出頹敗之現況與希望之所繫的張力；羅大經一方面抱持儒家原則，另一方面也批評缺乏應世之智的士人；羅大經既有善必終勝的信念，卻又不能全

然無視「勢」與「命」的作用。綜言之，何教授為我們展現了一位對理學有興趣的基層士人，如何以兼具樂觀與敏於世事的態度，理解蒙古威脅益重的時局，並以此面對其間含藏的暴力和人們的陷溺傾向。

李瑞教授的論文分析兩位北宋的畫者傳記編纂者（劉道醇、郭若虛）的三部著作，論述在北宋時期至少存在兩套不同的視覺運作模式。李教授指出不同的視覺運作模式，使劉道醇和郭若虛在陳述其觀賞經驗的要點、畫家的描摹特點、以及因觀賞圖像而引發的心理反應等面向上，都有關鍵的差異。他們或強調觀賞行動本身，或強調觀賞發生的社會情境；或著眼於寫生，或著眼於形神兼具；或重在描寫畫者呈現神奇之物及以此震懾觀者的能力，或重在觀者感受到畫中的動態，甚至其動態穿畫而出、彷彿改變了觀者周身環境的力量。除上述具體論點之外，李教授表示未來將廣泛考察不同文類中的「觀看」，目的不在求取共通的觀看模式，而在探究觀看模式的多樣性與可比較性，並進一步闡釋宋代「觀看」的知識結構。尤其值得矚目的，是李教授既掌握了西方「觀看」的理論，同時也強調以對照而非投射性的理解來彰顯宋代的獨特性。非常令人期待。

綜合而言，五位作者都著重了文獻分析的基本功，也充分關注文獻性質的差異，以及講究相應文獻性質而起的研究方法，因而從「文化」分析的角度考察遷徙，展現了行旅與日常生活的張力所引致的知識、行動、傳說及傳說之流傳的意涵，也揭顯南宋晚期艱難處境下的基層士人的複雜態度，以及北宋時期的視覺運作模式。五篇論文呼應 2019 年的國際研討會而新義迭出。我們盼望本專號不僅延續該次研討會的熱烈討論，更促成宋代研究同儕間的深刻對話。

